续写：形态类型、潜在结构和中国城市项目

Continuing to Write: Type-morphology, Latent Structures, and the Urban Project for the Chinese City

[意] 劳拉 · 安娜 · 佩泽蒂 文 | Written by Laura Anna Pezzetti
李焜　刘乾 译 | Translated by LI Kun and LIU Qian

中图分类号：TU-022/023/0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740(2025)02-0006-09　DOI：

摘要：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米兰传统”的城市与建筑研究方法，将城市场地视为可不断再写的“重写本”。文章强调，建筑设计不仅是理解城市现实的重要途径，也是一个在已有文本上书写、再写和覆盖的过程。作者首先指出建筑学是一门在历史基础上创新的学问，认为城市是物质与思想层层叠加的复合体，需要不断进行重新解读。通过对历史城市地图的分析，作者进一步讨论了基于文脉延续的城市理念与设计诠释，并指出现代城市设计应重视建筑环境的物质一致性和层次化的形态策略。同时，提出了从二元辩证法向组合思维的转变，强调调查与解释性地图在揭示聚落规则中的关键作用。通过两个案例研究，作者提出了在中国背景下的一种新研究方法，揭示了物质痕迹与非物质层次的叠加如何共同形成城市的记忆与叙事，并关注如何从类型的固有要素、潜在结构，以及类型 – 形态 – 地形三者关系的角度来解读历史聚落形态。最后，本文强调城市空间由多种编码交织而成，设计项目应基于对城市结构和历史的深刻理解，对现有城市文本进行新的刻写，以构建新的城市秩序与意义。

关键词：形态类型、潜在结构、米兰学派、文脉延续、聚落研究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an approach to studying cities and architecture based on the Milan tradition, emphasising architectural design as a way of understanding urban reality, considering the urban site as a ‘written palimpsest’ and considering design as a process of writing, rewriting, and overwriting upon an already-written text. The author begins by pointing out that architecture is a study of innovation based on history and that the city is a layering of materials and ideas that must be constantly reinterpreted. By analysing historical city maps, the author further discusses the continuity of urban concepts and design interpretations and emphasises the need for modern urban design to focus on the built environment’s material consistency and layering morphologies strategies. At the same time, a shift from dual dialectic to assemblage thinking is proposed, emphasising the importance of surveys and interpretive mapping in understanding settlement rules. Through two study cases, the author proposes a new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at reveals how the layering of physical traces and immaterial stratifications work together to form urban memories and narratives and focuses on how to read the morphology of historic settlements in terms of the typological invariants, latent structures, and the trip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ype-morphology-topography. Finally, the paper emphasises that urban space comprises multiple codes and that design projects should be based o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urban structure and history, with new inscriptions on existing urban texts to create new urban orders and meanings.

Keywords: Type-morphology, Latent structures, School of Milan, Continuation of context, Settlements research

作者：
[意] 劳拉 · 安娜 · 佩泽蒂（Laura Anna Pezzetti），米兰理工大学建筑、建成环境与建筑工程系副教授。

译者：
李焜，绿色建筑全国重点实验室、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刘乾，米兰理工大学建筑、建成环境与建筑工程系博士研究生。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基于文脉保护的城市风貌特色塑造理论与关键技术（2023YFC3805500）资助。

录用日期：2024-11

译者按语：

意大利米兰学派对城市研究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其对建筑作品的深入探讨和对城市环境的关注上，更在于其对类型学与形态学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虽然该学派的发展路径各具特色，但其核心理念一致，即通过对“建筑作品”“作为建筑不可回避的背景的城市”以及“场所与形式在建筑存在的原因中的重要性”进行持续反思，来塑造和提炼对建筑的理解和认识。

米兰学派的核心理念是将城市作为建筑的背景。该学派的关键人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和二战后的米兰建筑师，如厄内斯托·罗杰斯（Ernesto N. Rogers，1909—1969）及后来的圭多·卡内拉（Guido Canella，1931—2009）和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1931—1997）等人。这些建筑大师既是米兰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系（DPA）的教授，也是米兰理工大学民用建筑学院（Facoltà di Architettura Civile，1997—2015）的奠基人，他们对米兰学派思想传统的形成和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本文中，作者佩泽蒂教授以独特的视角，对米兰学派中形态类型学（亦被译作“类型形态学”[1]）领域的核心概念和研究传统进行了探讨，并引入了新的理论方法，强调建筑、城市和景观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整体性。这种观点认为，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将建筑、城市和景观三个方面视为一个有富有意义的、多层次的和连贯的统一体，通过深入挖掘文脉，揭示其形态的深层含义，从而实现对现实环境的自觉改造。

本文作者佩泽蒂教授曾在米兰理工大学和威尼斯建筑大学这两所知名学府接受严谨的学术训练，成长于米兰学派的深厚学术氛围里。在学术旅程中，她曾师从多位意大利建筑界的杰出人物，包括乔治·格拉西（Giorgio Grassi，1935—）、安东尼奥·莫内斯蒂罗利（Antonio Monestiroli，1940—2019）、安东尼奥·阿库托（Antonio Acuto，1940—2004）和亚历山德罗·克里斯托弗利斯（Alessandro Christofellis，1951—1991），在作者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圭多·卡内拉是她的毕业导师。后来作者在威尼斯建筑大学获得了建筑构成专业博士学位，导师为卢西亚诺·塞梅拉尼（Luciano Semerani，1933—2021）。

本文阐述了我发展的一项观点，该观点深植于城市建筑的“米兰传统”，认为建筑设计是一种洞察现实的独特方式。场地被构想为一个“重写本”（written palimpsest），而不是一块“空白的石板”（tabula rasa），设计则是在已有的文本上持续书写、再写和覆盖的过程。我们可以将再写（rewriting）定义为一种新的刻写和印记的叠加，这些新印记通过与先前文本中的原则、主题和痕迹的阅读及解释，建立起意义联系[2][3]。

建筑学是一门需要深思熟虑的学问，创新并非单纯追求新奇，而是在已有理念和物质基础上不断反思和改进的过程。它是对先前的思想和物质基础的深入思考，以创造出能够明确表达的新内容。

当卡纳莱托（Canaletto）在1756年至1759年期间创作出那幅描绘威尼斯幻景的画作时，他以逻辑形式组合了帕拉第奥（Palladio）的已建和未建设计，展现了某种城市理念：城市是思维的构建，是文明、文化和建筑研究的累积。这些有形和无形的理念构成了未来建筑的基石，正如拉丁语中“发明”（inventio）意味着“发现”，即在现有事物中发现新事物。

因此，建筑师是元素的组合者，这些元素本身是独立的实体[4]。尽管组成部分是固定的，但它们的组合结果却是创造性的且不可预测的。

城市是物质和观念层层叠加的产物，犹如一部杂糅的文本，每当我们进行城市设计时，都需要对其进行重新探索和解读。

例如，古罗马的大理石地图（203—211年，由G.B.皮拉内西重新绘制）和唐朝长安的石碑地图（由吕大防绘制，960—1279年）（图1），这些古老都城的石碑碎片一直为城市理念和设计的解释提供信息。

皮拉内西对罗马战神广场的重构（1762年）展示了建筑师对城市的解读是一种调查与想象、知识与设计的结合：废墟被赋予了创造性的潜能，空缺之处也因此成为了研究的课题。“一座古城中最令人神往的是深度感。遗迹之下隐藏着更古老的层次。”[5]①

我们需要将现代城市理解为城市材料、实体、形态、记忆和缺失的聚积，这种杂乱无序需要被阐释。此外，当前我们对现有建筑存量的关注前所未有，涉及建筑和景观的再利用、更新（reconditioning）和恢复（recovery），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建筑环境的物质统一性[6]，以及可称为“分层形态”（layering morphologies）[7]的“在城市之上建造城市”的策略。

为了深入探究中国聚落的物质与非物质双重维度，我们需要发展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将揭示物质遗迹是如何层层累积的，以及非物质层次如何通过文化建构形成独特且个性化的表达，共同孕育出记忆的共鸣和叙事的回响。从米兰城市研究传统中提炼的关键概念，为我们理论上的创新以及在特定中国环境下开辟新的研究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文脉作为共同演变的重写本

第一个理论和操作层面上的转变是采用结构性和历史性的“文脉”观念，重新定义“环境”和“评估”这两个不确定的概念。当项目被视为认知研究的文本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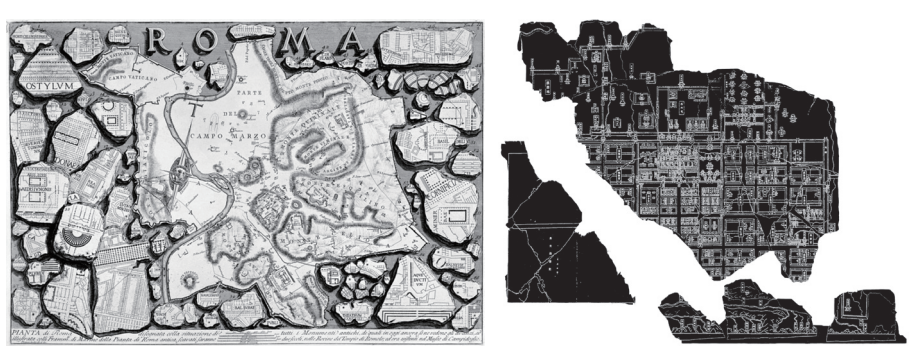

图1：古代罗马的大理石城市地图（Forma Urbis Marmorea，203—211年，由G.B. Piranesi重绘）和唐长安图碑（吕大防，960—1279年）

文脉便成为研究的焦点。建筑与聚落形态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研究的对象，也是新设计书写的最终目标。

当场地被视为一张满载信息的石碑（tabula plena），而非一张空白的石板（tabula rasa）时，设计就不再是空白场地上的随意创造，而是基于现状的一种新的写作，它需要对现有文本进行阅读、解释、赓衍或修改。被书写的场地不仅包含建筑结构，即建筑类型及其组织，还蕴含记忆、痕迹、植被现象、脆弱的印记、隐藏的层次、片段、不协调的改造以及重要的碎片。

文脉（context）是一种文化构建，它不仅限于场地的视觉维度，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它与出现在《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8] 和《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2011）[9] 中提到的“环境”（setting）概念有显著差异，尽管《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中提及了“历史上的层层积淀”（historic layering）。

就文本的语言元素而言，文脉表达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这些部分只有作为整体来理解时才具有有完整意义。场地通过其历史、地理和文化层面进行解读。深入探究深层结构，场地（或地点）不仅是当前可见的物质实体，更是建筑与记忆、符号与关系、断裂与对立的并置结果，它们既是形式，也是理念，还是记忆与空白。对这些内容的解码将首先（且不仅限于）在场地这一层层积淀的文本中展开。

因此，作为“文脉”的场所常常是不完整的、充满诸多可能性的文本，就像重写本（palimpsest）[7][10]~[12] 一样，包含了多重痕迹和不同的迹象，甚至包括未来的可能性。实际上，那些缺失的部分从未完全消失，因为它们在场所的深层记忆中留下了痕迹。对于那些“不在场”的形态，关键在于作为其基础并使其成为可能的“潜在结构”[3][7]。这一概念在中国的背景下被证明是有效的，在这里，潜在性、隐匿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常常成为拆迁、替代以及通过仿古形式重新历史化场所的理由。

因此，“文脉”不仅是历史形态的档案，也是一个遵循构成性规则、持续共同演变的鲜活有机体。形态学和地形学研究可以用于持续记录迹象以及缺失的部分，而我们的知识由什么构成，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城市建筑和城市项目

第二个转变涉及塑造城市项目（意大利语：Progetto Urbano）的建筑价值塑造，以及基于建筑设计之上的城市项目。

15 世纪末描绘乌尔比诺、巴尔的摩和柏林的三幅著名画作，体现了理想城市的理念及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新颖表达，这些表达源自对先前建筑类型的深入思考及其在新城市空间中的重新诠释。

城市建筑学是一种专注于塑造城市和聚落的民用建筑学。建筑作为一种城市现象，探讨了城市形态学（即城市形态的研究）与建筑类型学（即建筑形态的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类型的概念能够阐释建筑背后的功能性、文化性和象征性因素。通过确立类型，人类首次将需求与形式相结合，并将建筑视为一种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巩固的形式结构。

以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圭多·卡内拉（Guido Canella）和乔治·格拉西（Giorgio Grassi）等大师为首的米兰学派以其形态类型学研究而闻名[13]。他们的研究形成了一个互相衔接的链群，但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尽管在中国和一些国际形态学领域，形态类型学研究主要与“穆拉托里－卡尼基亚”方法紧密相关，但在意大利、欧洲和美国大学的形态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由“建筑小组”（Gruppo Architettura，1968—1974）② 和“坦丹萨学派”（La Tendenza）③ 聚拢的建筑师群体所创造的“米兰 - 威尼斯轴线”[14]④（Pezzetti，2021）。其中的一部分成员（罗西、卡内拉、艾莫尼诺、维塔莱和格拉西）在米兰建筑大师厄内斯托·罗杰斯⑤ 的影响下，加入了 *Casabella-Continuità* 杂志编辑部。他们重新审视现代建筑大师们的“遗产”，并倡导一种与“先存环境”（preesistenze ambientali）概念相关联的连续性理念。同时，这个群体还包括当时被称为“柱子青年”（giovani delle colonne）⑥ 的一批人，以及威尼斯建筑学院的朱塞佩·萨莫纳（Giuseppe Samonà）的门生，如波列塞洛、塞梅拉尼、卡内拉、罗西、提恩托利、法布里和塔夫里等。

根据卡内拉的定义，“类型学”被视为特定文脉中形态的不变要素（invariant），或者是从特定演替过程中提取的分类属性[15]，罗西也采用了这一观点[16]。考虑“不变性”的设计，意味着减少了主观性干扰，因为项目不再是个体想象的产物，而是基于历史和集体环境特性进行创造性的综合。正如罗杰斯所言，如果设计能表达对我们面前所有时间的认识，那么它所讲述的故事将更加丰富。

定义建筑城市性质的首个方法论由穆拉托里提出，他假设了类型的先验概念，其表现形式在城市组织（tissue）、历史维度、物质和材料现实中是可识别的[17]。这种“塑造形式”承认变化范围内的个体特征，“技术的统一和完整的实质”，“被视为完整的人类活动，换句话说，就是文明”[18]。

尽管米兰 - 威尼斯轴线的城市研究方法吸收并整合了穆拉托里的教导，但它并不简单地将历史分析与设计等同起来。相反，历史感被赋予了在实践层面上可演绎和操作的过程，以及分类特征[19]。

“综合”与“过程”的概念区分了两种形态类型学研究和设计方法，一种是在基于共时性来研究类型，通过发掘相关历史片段，探讨其在城市形式和结构中的应用和作用（如卡内拉、艾莫尼诺、罗西等人所做的工作）。另一种则侧重于研究形态的演变发展，从历时性研究视角将类型视为一个不断演变的结构，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形式结构（如穆拉托里、卡尼基亚等人所采取的方法）。

与卡尼基亚学派的类型学研究方法不同，类型学研究不依赖于发展过程中的偶然变化，也不通过简化的分类操作来描述这些变化，因为这些操作往往会导致设计方法的线性化和机械化。根据卡特勒梅尔·德昆西（Quatremère De Quincy）1788年至1825年间的《建筑学百科全书》里对“模式”（model）与“类型”的区分，类型允许重复与差异、变化与解释。类型更应被视为一种形式结构，它为植根于特定文脉的特征和结构形成的创造性综合提供了原则。通过参考具有生成属性的“类型”，“发明”（inventio）赋予了建筑作为文明载体的特征，即表达了“独特性中的普遍性”[20]。

通过将建筑形态与城市形态联系起来，这两条文化路径都超越了纯粹的功能主义。然而，前者在批判性地与试图将设计与历史等同的做法保持距离的同时，也在聚落现象的过程性与设计项目所要求的形式综合之间建立了辩证关系。

在考虑对旧建筑的干预时，我们必须区分“类型”与实际“对象”，并充分整合其历史上的层次和变迁。此外，米兰理工大学开发的修复 - 保护方法[21]对马可尼（Paolo Marconi）所提出的基于过程方法的“延迟执行（deferred execution）”和适应类型的方法[22]提出了批评。理由是，这种方法一方面忽略了任何与类型不符的元素，另一方面，它将设计简化为对模仿语言的保守干预，从而损害了真实性的概念。

相应地，城市形态学是对城市形式的研究。如果说类型学是“用于寻找形态学中不变部分的系统学”[23]，是从某种特定的连续性中衍生出的不同类别，那么形态学（morphology）则是在历史文脉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空间中展现的一系列事件。

为了研究城市随时间的变化，我们通过捕捉一系列城市转变阶段的历史片段来进行探索。每个片段都成为我们分析建筑类型与城市形态之间共时性结构关系的依据，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古迹与城市组织之间辩证关系的机会。在解读时，我们需要区分哪些是可以延续或需要引导和修正的，哪些部分代表了重大变革，以及哪些部分可能为未来的城市发展开辟新的可能性。

因此，描述并非是中立的。它不能仅仅是像卡尼基亚学派那样的罗列和列举，也不能仅仅是历史图像的堆砌，而必须包含每一段“书写”和图像与后续文字和图像之间的深层关系和意义。

意大利两种形态类型学方法之间的显著差异在于它们所使用的描述语言，这种语言不仅是方法的一部分，更像是一种组合代码，揭示了城市形态的复杂性。建筑学从形式结构的类型中汲取灵感，而城市设计则认为人为空间不仅是“基本建筑”的简单堆砌，而是形成形式结构和城市形象的基本元素，包括节奏、尺度和其他空间动态。正如罗西的“类比城市”所展示的，以类型和结构来思考意味着运用类比、记忆、图像和隐喻来进行思考。分析与设计之间不应有机械的转换。城市有其自身的演变过程，而建筑设计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综合。

萨莫纳曾对穆拉托里提出过质疑：城市现象的本质并非简单地从形态分析的归纳模型中直接得出，也不应局限于二维的图底关系——这相当于从格式塔心理学的分类法中挑选了一部分样本进行研究。城市形态的研究需要通过分析其结构关系和识别关键元素来进行，即通过识别形态学单元来探究城市形态。

尽管穆拉托里和萨莫纳存在分歧，但他们对“建筑小组”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城市现象特性的研究导致了对现代主义“白板（tabula rasa）”理念的拒绝，并转向支持文化连续性。如果新事物没有与现有的、作为文明载体的迹象和物质条件建立联系，那么它就可能成为一种抹去或压制历史痕迹的行为，而非对连续文化建构的再写或覆盖。

正如穆拉托里预见的那样，这些独特的理论定义了人类环境的各个方面和尺度，涵盖了从单个建筑到地域整体之间相互关联的所有层次。在同一时期，穆拉托里在《保护与修复》一文将城市发展定义为“作为随时间自我转变的建筑”[24]，而萨莫纳在研究人为结构时提出了“建筑与城市发展的统一”[25]，揭示了综合地理、地形、建筑类型以及经济和社会形式的聚居原则。

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不同之处：类型学过程是在时间变化中展开的，而不是从某些历史片段中学习完成的类型形式，因此不能简单地归类为动态或静态的概念。“共时”这一术语并不代表静态状态，而是一种建筑成就的体现。

建筑学通过融合自主（autonomous）和他律（heteronomous）的元素，成为一种特定的获取知识和探究现实的工具，而设计则是验证和解释这些知识的方法。对物质条件和文化进行分析，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用于审视社会背景及其在空间实体性方面的目标。

三、调查和解释性地图

调查是解读和设计城市的基本认知工具。分散的历史景观源于一种文化建构，我们只能在事后将其识别为一种分层的文本，这种文本以迹象的一致性、形式品质、标志性或典型性为特征。这个文本应当被当作一种层积现象来进行调查，即从历时性建造和共时性阅读的视角，发现并整理空间“重写本”的层次及其相关的特征和意义（包括文化和自然、有形和无形、历史和情感、文献和审美等方面）。

调查与地图制图的结合是解码聚落规则的第一步。它既提供了无处不在的垂直视角，能够深入历史的底层深度，同时记录可见与不可见迹象之间的联系；此外，它还提供了对景观的感知，尽管景观仅由片段组成，每次只能从一个地点捕捉到一部分。

为了理解聚落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地图制图的作用至关重要，它能够将历史留下的痕迹、标记和碎片重新整合，形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

拓扑关系的建立让城市中的各种元素和公共空间之间产生新的联系，这些联系不仅包括它们的大小、节奏和位置，还涉及它们如何连接、延续、继承、分离和相互依存。因此，类型学地图超越了实体与虚空关系的格式塔图像，不仅描述了类型和肌理，还细致描绘了墙壁、隔断及其空间序列。

四、从二元辩证到组合思维

通过城市起源的底层结构、历史结构的层积以及蕴含的文化叙事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理解城市形态，这对于“继续书写”[2][3]由现存城市构成的文本至关重要。

中国的历史地段通常被视为一种去空间化的文本记忆场所，往往存在物质真实性（substance）的缺失，其潜在的消失状态与对非物质价值的过度高估，常为不合理拆除、替换以及通过复制品进行的重新历史化提供借口。然而，如果能不仅通过肉眼所能看到的事物来理解场所，而是将其视为历史上多层次、文化上明确界定的环境，我们就能开创一种方法，将场所解码为“已被书写”的文本，这种文本需要通过解读以指导未来的书写。

赣州古城南市街所在的历史街区是一个已经难以解读的典型城市文本。它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复合型“城市局部”（即艾莫尼诺在 1970 年提出的“parti di città”[26]）城市形态的代表性案例，展现了连续的或常见的商住混合结构与具有特殊尺度和用途的节点（如寺庙）之间的碰撞。在中国，这两类组成部分的形态和构成研究通常是分开进行的，尤其是后者，主要由历史学家和修复工作者从风格角度进行研究。

在宋代城市扩张期间，主要的文化和教育设施集中在这个街区。街区地势较高的中心区域，目前三座寺庙中有两座的部分遗迹与慈云塔一起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历史地段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南市街，其中一些合院式民居已被纳入现行保护规划，列为“历史建筑”和“传统建筑”。

为了阐释城市演变的过程，罗西提出了一种基于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即永恒不变的象征性形式与不断变化的居住肌理之间的对立（图 2）。我们对南市街的研究（2023—2024）显示，在中国城市中图样可以观察到类似的主要元素与居住肌理之间的双重辩证关系[27]，或者特殊节点建筑与连续建筑形态之间的关系[28]。

通过分析类型学和形态学的原则，并结合解读地形留下的痕迹与缺失的部分，我们的研究识别出了两个不变的形态类型学特征，并揭示了场地复杂的“潜在结构”[2][3][7]，以及仍然影响场地可读性和可改造性的隐藏秩序（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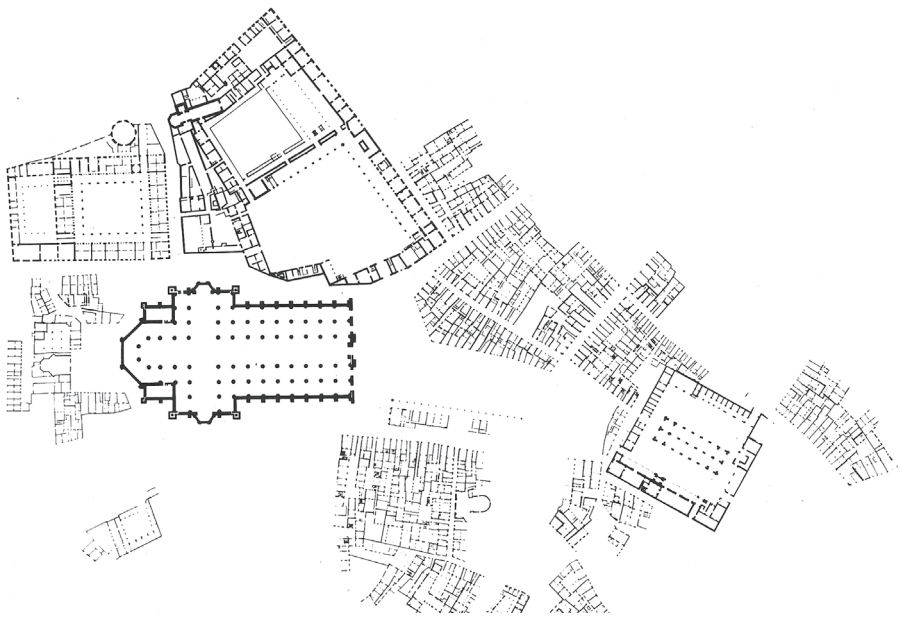

图 3：关于米兰的地形研究中的类型学平面图，1967 年由阿尔多 · 罗西（与 V. Gavazzeni 和 M. Scolari 合作）完成

图 2：对南市街（赣州）形态语义单元的研究分析地图，分别显示的是潜在结构共时性分析、1966 年平面图、2019 年的建筑平面类型学研究

形态类型学已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用于探究城市中现存和已消失的形态特征。将这一工具与地形分析相结合，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城市的发展。在现代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古老元素被抹去，导致城市布局显得混乱无序。但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了双重“潜在结构”，它根据两种不同的原则和角色组织街区。第一种与当地庭院类型形成的组织有关，确立了街区边界；第二种由寺庙、宝塔等主要建筑元素构成，自然而然地成为街区的中心。前者沿着路网以鱼骨图案序列排列，通过紧凑布局形成了清晰的街区边界；后者则与城市外围的特定地理标志物建立远距离联系，从而形成其轴线和布局，构成自组织的空间化广场。这两种模式的结合产生了图形的组合和网格的碰撞，这与从哈德良别墅到拼贴城市[29]等理论原则相呼应，并与城市形态的图像解释学（iconology）紧密相关。

最后，福寿沟地下排水系统与城市地形的层次相结合，被认为是理解宋代街区复杂平面逻辑的关键，它构成了城市结构的地下蓝图。这三种秩序——即庭院类型、标志性建筑以及地下排水系统，在街区中共同形成了一个复合的景观单元，这个单元可以被识别为一个“形态语义单元”[7]，它通过构成类型秩序的持久性而非时间或视觉上的统一性来定义。

对这些复合“潜在结构”及其在街区内集合原则的理解，揭示了中国城市构成中非同寻常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容忽视。三个基本要素之间以及多种形式秩序之间的相互作用，应当作为任何行动的基础，无论是划定保护区边界还是进行城市更新项目。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明确一致性与不一致性、永久性与变异性、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等变量，以此为基础，重新构建一种共同演化的城市形态原则。

只有通过深入探究这些类别，我们才能将建筑遗产重新连接到城市形态的逻辑中，并为新的、有意识的当代书写提供可能性。过去的形式因此在当下得到体现。集合（Assemblage）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种将特定的异质元素组合在一起的方法。集合原则包含了多种构成原理，这些原理在建筑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甚至早于“如画派”（Picturesque）及其从中国园林中借鉴的“Sharawaggi”原则。

哈德良别墅（Villa Adriana，118—138）作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西方建筑师的建筑典范，是整合多种异质元素集合的杰出范例。它赋予了各个部分自主性，形成了基于多重轴线的开放式组合，并为观察者提供了一条沿着空间序列探索的步行路径。

艾莫尼诺（Aymonino）在米兰设计的著名加拉拉泰斯住宅综合体（Gallaratese residential complex，1967—1972）⑦，是对哈德良别墅策略的一种清晰转译（图4）。它被视为一个“城市建筑体”，其中住宅建筑被构想为一个“城市局部”——既独立存在又与城市环境相融合。罗西（Rossi）在该项目中设计了一种独特的线性结构，重新诠释了米兰的空中步道。艾莫尼诺则采用“城市的形态”概念来构思其设计，运用了包括坡道、小径、连接点、长廊和圆形剧场在内的丰富城市元素，创造出了复杂多样的形态。

在西安“国际美术城”（总体规划由刘克成工作室负责）的一个街区设计中，我探索了城市建筑体作为“空间 - 场所”集合的潜力，挑战了传统的分区网格以及基于“空白石板”（tabula rasa）理念衍生出的孤立建筑设计方法。在以丝绸之路沿线文明为灵感进行主题发展的过程中，该设计塑造了一个整体性的建筑基座，旨在与其他街区建立联系，并创造出相互连通的公共空间，进而形成了丰富的城市形态和地形。基座之上的建筑实体被设计为城市景观的亮点，旨在为周边空旷的环境提供一个标志性元素（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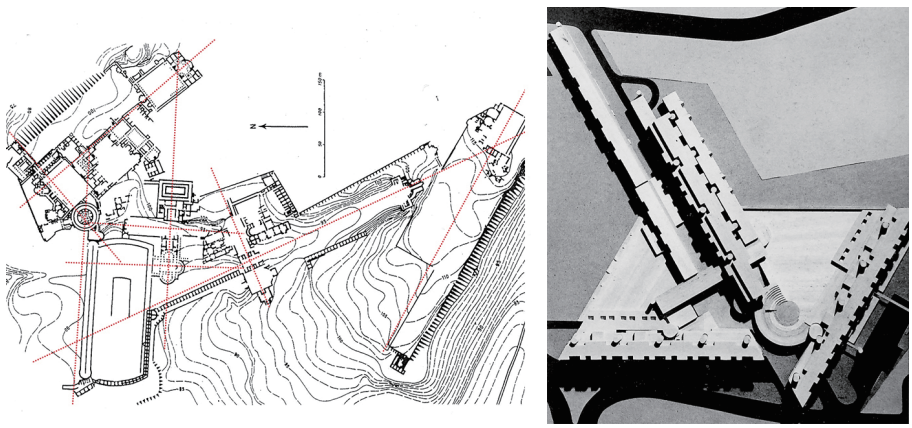

图4：哈德良别墅（Villa Adriana，118—138年）平面图和卡洛·艾莫尼诺（C. Aymonino）设计的米兰加拉拉泰斯住宅区模型（Gallaratese residential complex，1967—197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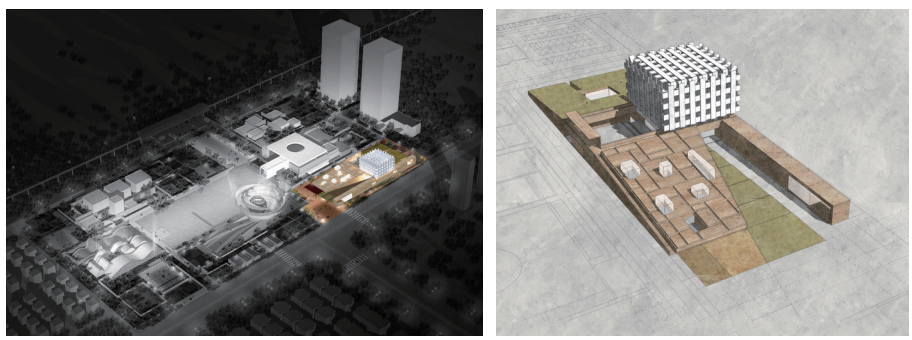

图5：作者设计的西安“国际美术城”罗马博物馆设计（总规划由刘克成负责），2016年

五、在潜在结构上书写：大地的记忆

在城市和区域的累积与抹除过程中，地形作为一种丰富的元素，能够重建类型、层叠形态和景观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也存在于建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安德烈·科尔博兹（André Corboz）提出了“重写本”的比喻[11]，将城市和地域描绘为积累与抹除的过程，这一比喻深化了意大利对物质文化的讨论。

尽管《欧洲景观公约》声明“并非一切皆为景观”，但景观这一多变且尚未完全确定的概念[30]如今似乎囊括了几乎所有事物，并存在将景观的所有内容稀释于“环境”和“地方”这些模糊概念中的风险。这意味着我们对景观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其可视的部分，因为景观的形成源于深层的人类聚居结构，以及文明与自然地理因素长期共同演变的过程[31]。

沿着这一思路，历史景观的概念可以作为一种系统性的文脉处理方法。它将文脉视为“结构的结构”[7][32]，用于识别历史发展、结构相互作用及形态单元中的跨尺度要素，以及城市和乡村聚落间的连续性和相互定义关系。

“大地被‘书写’”这一观点，提供了一种从历史的深度与演变中同时观察时间和空间的视角[7]。这种观念在中国尤其适用，因为这里的大地记忆不仅限于建筑物和地块的划分。理解大地“书写”的结果，有助于重建某一地方的特定记忆。

城市形态在记录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建筑物消失时，失去的形式几乎总会在一个地方的深层记忆中留下痕迹。大地展现了这种历史层次的累积，以及建筑与城市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地方是一个既存在缺失又充满可能性的文本，涵盖了各种痕迹和不同的标记，甚至预示了未来的痕迹。因此，意大利学者的研究首先探讨了特定区域内大地形态的遥远起源及其延续性。

六、关于村落研究：类型的不变要素、潜在的结构，以及类型—形态—地形的三重关系

城市和区域是由文化和形态互相交织构成的结构。当前，中国历史和传统村落正面临乡村开发以及随之引入的标准化商业旅游项目的威胁。此外，过于简化的开发和保护规划忽视了形态学研究，忽略了聚落形态的文化意义以及作为文化遗产的聚落结构的物质存在。这种忽视抹去了聚落深层的地貌秩序及乡村景观的真实特征。

由于历史村镇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旅游商业化和乡村开发的挑战，中国传统村落的未来前景堪忧，仅有不到 3% 的村落被列入保护名录。村落研究是一个充满潜力的领域。农村村落不仅是传统文化和乡愁的承载地，也是中国聚落形态得以真实延续的地方。

现有的历史景观的调查和评估方法已被证明不足以解读那些超越风格和风土传统之外的聚落原则及其潜在的形态结构[32]。然而，这些方法对于理解单一建筑类型与聚落和景观形态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它们为认知整个聚落有机体的“知识项目”（knowledge project）提供了科学和文化基础。保护、再生和可持续发展应基于这一基础进行综合考量。

对陕西凤凰古镇的研究旨在提出一种分析手段，以捕捉独特的地方精神（locus solus），并阐明整体的“阅读 - 解码”过程及其形势和山水原则[7][32]。

这个整体由多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塑造，包括庭院类型的固有要素、随时间排列的各种形态单元，以及它们与背景地貌和地形配置之间的联系。这种互动关系形成了一个独特且多年代并存的复杂景观形象。

研究通过调查散落的痕迹和线索，结合有限的历史记录，揭示了结构关系，并识别出景观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多个亚结构和形态单元。深入的调查界定了地形上的所有现存元素，并揭示出这个古镇建立在三个主要且相互关联的要素之上[7][32]：

第一个要素是类型的固有性特征（独特的窄院类型，它在典型关中民居院落类型的基础上，融合了因内河运输和移民而来的楚、吴文化特征）与聚落整体弯曲线性结构之间的关系。除了常见的院落类型和商业道路的结合，这里的建筑地块和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还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形态类型，例如带有围墙的菜园。通过从历史过程中识别出的形态类型，研究进一步确定了各种“形态语义单元”[7]，并重新审视了保护范围的划定方式，该方式基于聚落结构规则和特征的持续性来区分不同单元，而不仅依据年代或视觉观感的一致性。

这些概念重新定义了保护对象与简单地划定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环境协调区相比，研究定义的保护对象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另一方面，通过记录聚落为适应地形和共同演化所引起的变化，研究识别了类型的“实际应用，即形成建筑肌理”[17]。这表明，当前中国某些保护实践中混淆“先验类型”（或原型）与“真实类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前者指的是一个参考的形式结构，而后者则是指具体的、不可替代的建筑物[7]。

第二个因素是研究发现的聚落背景条件，我将其定义为潜在结构。建筑形态类型、山谷地理（河流的曲折）以及聚落的扇形地形之间的关联，揭示了一个潜在的放射形结构，该结构与沿商业道路的庭院线性排列相垂直（图 6）。

不同年代的测绘图显示，聚落的形态类型具有一个原始的放射形结构，其放射线汇聚于营盘山的高地。因此，早期定居者认为聚落的形态宛如凤凰展开的翅膀。这一结构定义了整个聚落，从窄院的地块分界延伸到后院和菜园，再到河岸墙的田野划分，最终与选定的山峰构成理想的三角关系。这个结构统一了整体景观，从山峰到河流，为山水和形势原则提供了具体的形态表现。

研究发现，凤凰镇里最近被破坏的乡村景观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亚结构，它揭

示了该镇的背景条件的关键，展示了“人与土地之间持久而深厚的联系的整体”[33]。

历时性的解读研究了这一结构在不同年代的历史发展，识别出在原始放射形结构之上叠置了五种不同的聚落布局，这些布局从未完全抹去凤凰镇的背景条件。此外，这种潜在结构为古镇的其他部分和时期提供了潜在的一致性和历时真实性，形成了复合的“形态语义单元”。

这些分析挑战了现有的保护对象及其保护区划分，因为它们将保护区限定在线性主街及其两侧的建筑物，并将保护区划分简化为“缓冲区”和“发展区”的边界和概念。所有上述研究发现都表明，有必要基于这些形态类型及相关形态语义单元（包括农田和墓地）的证据，制定更为详尽的保护区划分和规划。

扇形的“土地形象”[7]蕴含着美学和文化价值，应当得到保护与强化：首先，它具有结构价值，因为该聚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代早期的农业活动；其次，它具有类型学和形态学价值，其根源在于镇里的窄院类型；最后，它具有景观价值，因为它描绘了连接山水的扇形模式。

最后，第三个因素是由潜在结构在建筑类型、形态与农田地形结构之间建立的三重关系。也就是说，这里的建筑类型、自然地理元素和乡村景观自唐代开垦以来一直相作用。

上述潜在地形结构的痕迹为中国传统的形势和山水原则——即中国文化中“风景”概念的基础——提供了一个具体且外在的空间形式。这种形式在未来的设计过程中值得进行分析和传承。潜在结构的力线（lines of force）通过空旷地带建立了山与水之间的联系，使人联想到中国山水画，在那些画作里，物体之间隐含的线条界定了它们的关系[34]。

通过发掘这种源自初始三重关系的韧性结构，研究揭示了在中国语境下，某些潜在的解读和分析路径尚待探索，亟须引起重视。上述潜在结构构成了该聚落的主要背景框架，支撑着当前乡村景观中可见的诸多要素。这种地域形象（territorial figure）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构成凤凰“翅膀”的实体建筑遗产。二者均产生于并共存于一种体现凤凰镇城乡形态核心的互构关系之中。此外，制图工作还揭示了上述结构的力量线同样影响了后续建设的传统风格建筑及简陋自建房的位置选择。

图 6：显现放射形潜在结构的陕西柞水凤凰古镇共时性地图研究和展示典型问题区域类型学分析的平面图，2019 年

通过超越表面现象的深入挖掘，上述潜在结构的发现为重塑整个城乡（rurban）形态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构成逻辑。凤凰的潜在形态揭示了扇形辐射结构的潜在连续性和象征性，亟须最大限度地加以保护，以期重新联结割裂的城乡板块，并将新建设融入其中，从而推动城乡景观的复兴与可持续提升。

在实地工作坊和米兰理工大学的课程设计中，我们设计了若干实验性项目，并在四个典型的难题区域中尝试了几种设计方案：典型形态类型、烧毁的庭院和残破庙宇留下的空地、与历史背景有所差异的新填充、新的低碳城—乡（rurban）原型。

七、多重编码

最后，我们必须承认，城市空间已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可以被一致编码阅读的文本或符号系统。在中国，历史空间往往隐藏在多个不一致的“文本”之下，例如基础设施、分区规划、城中村、棚户区、封闭社区等，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潜在的都市空间。

因此，我们不能继续采取彻底清除旧有肌理，然后强行植入一个尺度和特色都不匹配的新项目的做法。即使这些新项目的建筑设计本身非常出色，这种做法也是不可取的。正如在西安小雁塔和碑林博物馆扩建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区域实际上是传统院落式民居所在的地段）。

通过对西安小雁塔及其周边出土的唐代遗址的考察（图 7），我们发现这个地方体现了一种无法简单通过修复古迹或修建仿古建筑来来解释的历史厚重感和时间感。那些碎片化的遗迹是对缺失部分的深刻认知。在拆除其周围结构之前，有必要解码这一历史集合的特质，以便决定需要保护、提升、拆除或再生的内容，并明确如何及为何这样做（图 8）。这里的遗产不仅是纪念碑式的佛塔及其周围的建筑群，还应包括里坊的整体形态和可以从中读出的多重历史痕迹。

当设计项目从识别已有的形式秩序出发时，它便超越了单纯填补城市空白或构建孤立物体的范畴。相反，它成为了一种对既有城市文本的新铭刻，基于对结构、类型、痕迹、记忆、拆除及缺失的理解与解读。从“满载信息的石碑”（tabula plena）中，历史的背景条件、叠加、缺失及多样的层叠形态都能在新的复合城市秩序中得以再现。这种解读使现存的城市文本重新变得可读且富有意义，同时也为创新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新的城市建筑不仅承载着建筑项目的文明角色，还真实地解读并记录了我们所有的历史时期。

“每一个时代都会从精神上建立自己对历史的过去的看法。建立自己的罗马和雅典，自己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35]⑧历史是为当下而书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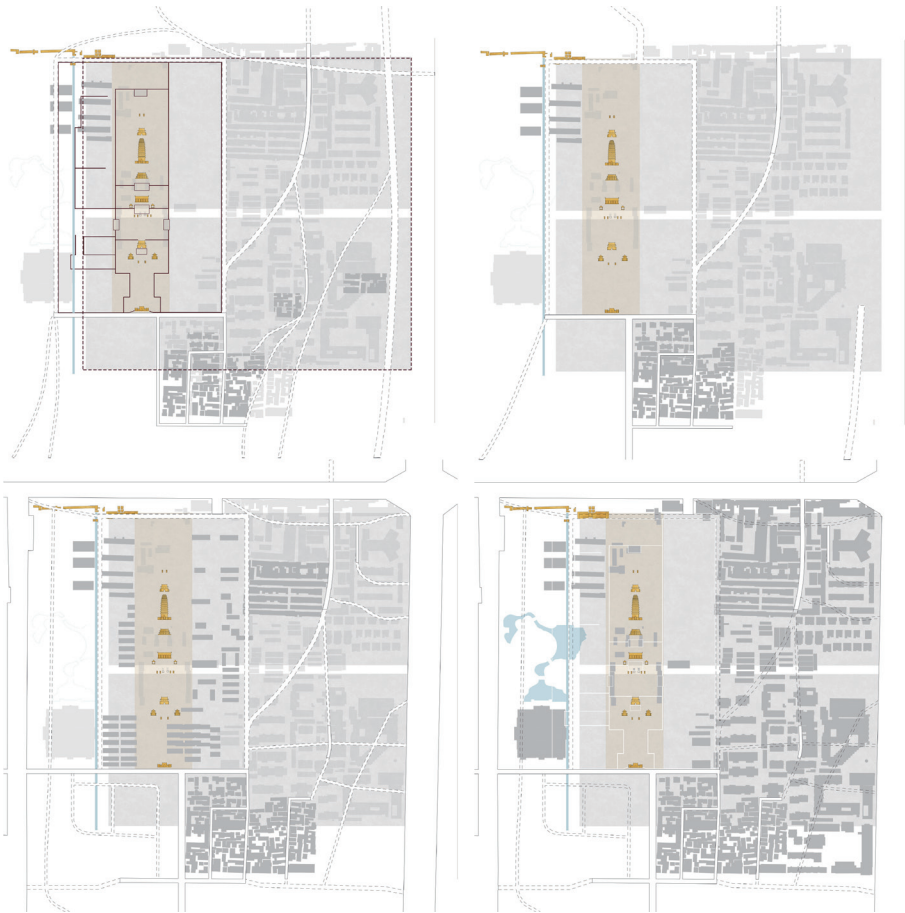

图 7：西安小雁塔和安仁坊历史地段的历时与共时地图叠置，分别为 1933 年、1949—1953 年、1970—1982 年、2000—201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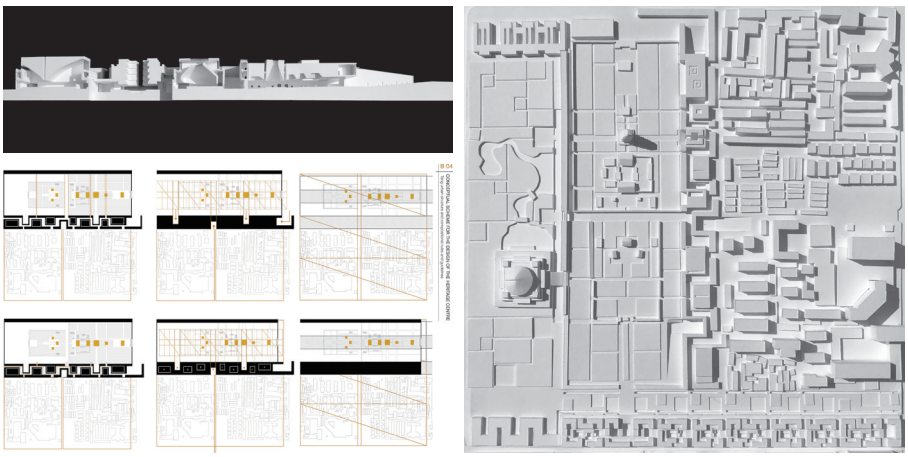

图 8：西安小雁塔和安仁坊历史地段的再写与再生的研究与设计

注释

① 译者注：本句译文参考了中文译本：（美）凯文·林奇 . 此地何时 [M]. 赵祖华译 . 合肥：时代出版传媒有限公司，2016：179.

② 译者注：威尼斯建筑学院教学和研究群体——建筑小组“Gruppo Architettura”（1968—1974）由朱塞佩·萨莫纳（Giuseppe Samonà）领导，成员包括圭多·卡内拉（Guido Canella，1931—2009）、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1931—1997）、卡洛·艾莫尼诺（Carlo Aymonino，1926—2010）、贾努戈·波列塞洛（Gianugo Polesello，1930—2007）、卢西亚诺·塞梅拉尼（Luciano Semerani，1933—2021）、弗朗切斯科·坦托里（Francesco Tentori，1931—2009）、科斯坦蒂诺·达尔迪（Costantino Dardi，1936—1991）、拉斐尔·帕内拉（Raffaele Panella，1937—2016）、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1935—1994）、吉安尼·法布里（Gianni Fabbri，1939—）等。

③ 译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建筑师致力于寻找新的语言和新的表达方式。坦丹萨学派（La Tendenza）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约 1965 至 1985 年之间），在罗马、威尼斯和米兰的建筑界以及评论界、学术界和知识界兴起的一场思想运动，并在瑞士、西班牙、英国甚至美国引发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建筑讨论。当时的意大利新一代建筑师们在通过对城市现实的重读和对历史的回溯，构想设计与城市和建筑的新关系。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被认为是其中的领导者。这种新的建筑理论对前卫的概念提出了质疑，拒绝乌托邦并提出一种与现实相结合的政治和批判建筑观念。Tendenza 一词即“趋势”，该名称起源于罗西于 1966 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作为趋势建筑的理性建筑》（*L'architettura della ragione come architettura di tendenza*）。

④ 译者注：“米兰 - 威尼斯轴线”（Axis Milan-Venice）指的是围绕厄内斯托·罗杰斯（Ernesto N. Rogers，1909—1969）和朱塞佩·萨莫纳（Giuseppe Samonà，1898—1983）的教学而发展起来的“建筑小组”。这些建筑师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在导师罗杰斯和萨莫纳的理论影响下共同成长。罗杰斯和萨莫纳的重要学术贡献是将“整体设计行为”（unitary act of design）理论化，强调在设计过程中需要把设计行为与整个环境中的各个要素以及不同尺度的结构联系起来。

⑤ 译者注：厄内斯托·内森·罗杰斯（Ernesto Nathan Rogers），1909 年出生于意大利，1969 年逝世，是一位杰出的意大利建筑师、评论家及出版商，同时也是建筑设计合伙人事务所 Studio BBPR Milano 的创始成员之一。罗杰斯于 1932 年从米兰理工大学建筑系毕业，成为了意大利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关键人物，对意大利建筑与设计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在意大利建筑理性主义（Razionalismo Italiano）的确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 年至 1947 年间，在他短暂出任 *Domus* 杂志主编期间，推动该杂志发展为拥有国际声誉的建筑期刊。1953 年至 1964 年间，他一直担任 *Casabella* 杂志（当时刊名为 *Casabella-continuita*）的主编，利用这一学术阵地，罗杰斯支持并推广了意大利新自由主义（Neo-Liberty）建筑理论，对当时欧洲的建筑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了在出版界的贡献外，罗杰斯的教学活动也是其职业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1952 年至 1956 年间，他与伊尼亚齐奥·加德拉（Ignazio Gardella）、佛朗哥·阿尔比尼（Franco Albini）以及朱塞佩·萨莫纳（Giuseppe Samonà）共同在威尼斯举办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暑期学校授课。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罗杰斯被聘为米兰理工大学教授，直至 1969 年去世，始终致力于建筑教育事业。

⑥ 译者注：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米兰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一些学生开始在课程设计中使用一系列非常个人化的风格，这些风格与一定的历史和传统基础相关，进而引发了一场抗议，意在批判当时大学教育倡导的理性主义方法（razionalismo di maniera）和国际风格的局限性。根据吉安卡洛·德·卡尔洛（Giancarlo De Carlo）在 *Casabella-Continuità* 杂志上的表述，当时的一群年轻人如 Michele Achilli、Daniele Brigidini、Maurizio Calzavara、Guido Canella、Fredi Drugman、Laura Lazzari、Giusa Marcialis、Aldo

Rossi、Giacomo Scarpini、Silvano Tintori 和 Virgilio Vercelloni 在正式研究中大胆使用柱列、拱券和尖塔，因而获得了“柱子青年”的绰号。

⑦ 译者注：1960 年代的米兰尚未摆脱战后住宅短缺的窘境，保障性社会住宅的建设仍在进行。其中一个重要的住宅区就是位于米兰西北郊区的 Gallaratese。当时该处的建设已持续到二期（Gallaratese II），建筑师卡洛·艾莫尼诺（Carlo Aymonino）在获得二期项目的设计权之后，邀请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共同设计。该项目主要由四栋住宅楼组成，其中一栋由罗西主持设计，其余三栋则出自艾莫尼诺之手。

⑧ 译者注：本句引自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译文参考了中文译本：（法）吕西安·费弗尔．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 [M]. 闫素伟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7.

参考文献

[1] 邓浩，朱佩怡，韩冬青.可操作的城市历史——阅读意大利建筑师萨维利奥·穆拉托里的类型形态学思想及其设计实践 [J]. 建筑师，2016 (01)：52-61.

[2] PEZZETTI L A. Continuare a scrivere nel paesaggio storico：Lettura，interpretazione，figurazione[M]. LetteraVentidue：Siracusa，2020.

[3] PEZZETTI L A. Rewriting Urban Strata in China：Reading，Interpreting，Recoding Xi´an Xiaoyan Ta´s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M]. Padua：Il Poligrafo，2020.

[4] KAHN，L I. Address by Louis I. Kahn[J]. Boston Society of Architects Journal. 1967 (01)：7-20.

[5] LYNCH K M. What time is this place? [M]. 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1976.

[6] VIGANÒ P. Types，prototypes and the project of the city [M]// GERBER A，ISELI R，KURATH S，PRIMAS U (Eds.) The Morphology of Urban Landscapes，Berlin：Reimer，2021：49-61.

[7] PEZZETTI L A. Layered morphologies and latent structures：Reading，decoding and rewriting to enhance historic Rurban landscape[M]. Shanghai：Tongji University Press，2019.

[8]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9] UNESCO，Recommendation on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M]. Paris：UNESCO，2011.

[10] GEDDES P. Cities in evoluti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town planning movement and to the study of civics[M]. London：Williams，1915.

[11] CORBOZ A. Le territoire comme palimpseste[J]. Diogène，1983 (121)：177-191.

[12] 劳拉·安娜·佩泽蒂，张顺圆.覆盖“城市重写本”——历史公共空间和建筑的再生结构 [J]. 新建筑，2019 (02)：5-14.

[13] AYMONINO C. La città de Padova：saggio di analisi urbana[M]. Rome：Officina，1970.

[14] PEZZETTI L A. Il magistero di Canella e Rossi nella Scuola di Milano：Della ragione del contesto e dell´inventio progettuale tra strutturalità，tipologia e morfologia/The lesson of Canella and Rossi within the School of Milan. The Rationale of Context and Design Inventio between Structurality，Typology and Morphology[J]. U+ D URBANFORM AND DESIGN，2021 (15)：146-151.

[15] CANELLA G. Dal laboratorio della composizione[M]// Canella G.，Coppa M.，Gregotti V.，Rossi A.，Samona´ A.，Scimeni G.，Semerani L.，Tafuri M. (1968) Teoria della progettazione architettonica，introduction by G. Samonà. Bari：Dedalo，1985：86.

[16] ROSSI A. Tipologia，manualistica e architettura[M]// Rapporti tra morfologia urbana e tipologia edilizia. Documenti del corso di caratteri distributivi degli edifici. Venice：Cluva. 1966：69–81.

[17] MURATORI S. Studi per un´operante storia urbana di Venezia[M]. Rome：Istituto poligrafico dello Stato，1960.

[18] MURATORI S. Architettura e civiltà in crisi[M]. Rome：Centro Studi di Storia Urbanistica)，1963.

[19] AYMONINO C. Il significato delle città di Carlo[M]. Bari：Laterza，1975.

[20] DELEUZE G.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

[21] DEZZI BARDESCHI M. Restauro：due punti e da capo[M]. Milano：Franco Angeli，2008.

[22] MARCONI P. Il restauro e l´architetto：teoria e pratica in due secoli di dibattito[M]. Venezia：Marsilio，1993.

[23] CANELLA G. Dieci opinioni sul tipo：Interventi di Oswald Mathias Ungers，Oriol Bohigas. Carlo Aymonino，Anton Schweighofer，Aldo Rossi，Manuel de Sola，Ludovico Quaroni，Rob Krier，Guido Canella，Aldo van Eyck[J]. Casabella，1985 (509-510)：92-122.

[24] MURATORI S. Conservazione e restauri[C] //Atti del VII Congresso Nazionale di Storia dell´Architettura，Palermo：Comitato presso la Soprintendenza ai monumenti，1950 (1955)：16.

[25] SAMONÀ，G. L´unità architettura urbanistica. Scritti e progetti 1929—1973 [M]. Milan：Franco Angeli，1978.

[26] AYMONINO C. Il significato delle città[M]. Bari：Laterza，1975.

[27] ROSSI A. L´architettura della città[M]. Padua：Marsilio，1966.

[28] CANIGGIA G，MAFFEI G L. Composizione architettonica e tipologia edilizia vol. 1 lettura dell´edilizia di base[M]. Venezia：Marsilio，2008.

[29] ROWE C，KOETTER F. Collage city[M]. 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1979.

[30] ZAGARI F. Questo è paesaggio. 48 definizioni [M]. Rome：Mancosu，2006.

[31] BRAUDEL F. La méditerranée. L´espace et l´histoire [M]. Paris：Flammarion，1985.

[32] PEZZETTI L A. Layered morphologies and topographical structures in historic Rurban landscape：Integrating typo-morphological，topographical and landscape tools with Feng Shui[M]// Camiz A.，Geddes I. Cities as Assemblages：Proceedings of the XXVI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Urban Form 2019，Vol. 1. Rome：Tab Edizioni，117-132.

[33] LEBEAU R. Les grands types de structures agraires dans le monde[M]. Paris：Masson，1969.

[34] CHENG F. Vide et plein：le langage pictural chinois[M]. Paris：Edition du Seuil，1979.

[35] FEBVRE L. 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la religion de Rabelais [M]. Paris：Albin Michel，1942.

图片来源

图 1、图 7：PEZZETTI L A. Rewriting Urban Strata in China. Reading，Interpreting，Recoding Xi´an Xiaoyan Ta´s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M]. Il poligrafo，2020.

图 2：REICHLIN B.，Tipo e tradizione del Moderno[J]. Casabella，1985 (509-510)：32-39.

图 3：作者绘制

图 4：左图由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改绘，右图 AYMONINO C. Piazze d´Italia：Progettare gli spazi aperti [M]. Milan：Electa，1988：39.

图 5：左图由刘克成工作室提供，右图由作者绘制

图 6：Pezzetti L A. Layered morphologies and latent structures：Reading，decoding and rewriting to enhance historic Rurban landscape[M]. Tongji University Press，2019

图 8：引自 G. 马祖凯利（G. Mazzucchelli）和 G. 波佐利（G. Pozzoli）的米兰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由 L.A. 佩泽蒂（L.A. Pezzetti）指导